

批评的建立与小说的评价史问题 ——以80年代的王安忆小说批评为例

邓 婕, 毕文君

(东华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13)

摘 要 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已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的“元问题”,小说批评在其中具有极为典型的示范意义。而以80年代的王安忆小说批评为例,梳理新时期文学批评在建立过程中所引发的批评模式、批评话语、批评姿态的转变,这不仅表征了当代文学批评在面临具体作家作品时的共性问题,也意味着新时期的小说评价过程中在评价范式与审美标准上凸显的小说评价史问题。

关键词 王安忆小说 80年代文学 小说批评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66(2014)03-0034-06

The Establishment of Criticism and History of Novel Evaluation ——Taking Wang Anyi's Novel Criticism in the 1980s for Example

DENG Jie, BI Wenju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East Chin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chang Jiangxi 330013, China)

Abstract: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1980s has become a “meta-ques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and novel criticism, and it has the typical demonstration significance. While in Wang Anyi's novel criticism in the 1980s, for example, the new period of literature criticism in its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has triggered the changes of criticism mode, critical discourse and criticism attitude. Combining these changes not only reveals the common problems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when faced with specific writers and their works, but also means that new period novels in the process of evaluation highlight the history of novel evalua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evaluation paradigm and aesthetic standards.

Key Words: Wang Anyi's Novels ; Literature of the 1980s ; Novel Criticism

“80年代”在学界的话语中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年代的所指,而是一个不断被问题化的对象和范畴。它作为一个诗意性与实验性的存在,其知识立场、思想谱系、观念来源以及与前三十年历史的

关系等问题不再是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结果而被接受,而成为学者知识考古的对象。程光炜在《“当代”文学的理解:基于80年代文学研究》中提到:“今天很多对十七年、90年代、包括对当代文学的

收稿日期 2013-10-14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青年项目“评价史视阈下的80年代小说研究”(12WX28)

作者简介:邓婕(1989-),女,湖北武汉人。东华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20世纪文学批评;毕文君(1979-),女,山东烟台人。东华理工大学中文系讲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当代文学批评。

看法,都是从80年代的知识立场中孕育出来的,那里原来有很多没有被充分意识到和理解的所谓‘知识的原点’。”^[1]王安忆作为中国当代文坛实力深厚且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女作家,从70年代末至今,她的创作实践见证了近30年中国文学发展的全过程,也经历新时期文学发展转型的各种阵痛。因此将王安忆80年代小说批评作为一个典型案例进行研究,一方面从历时性的角度而站在今天的语境重新去解读这些80年代的文学批评,可以更好地理解与发现80年代文学批评与当下文学批评的联系与偏差,进一步探索80年代的文学批评何以“积淀为我们无法绕过的各种有关文学的知识和批评经验”^[2]的原因,了解它从哪些方面“仍然深刻制约和影响着我们今天对文学作品每一个侧面的仔细阅读和理解”^[2]。另一方面,在共时性研究的关照之下,只有把王安忆80年代小说批评放在整个80年代文学批评的大环境中进行考量,从文学史的全局视野出发,才能意识到具体作品的批评与研究本身所蕴含的独特性,才能“更具历史张力地认识80年代的文学批评,认识整个80年代的历史”^[2]。

一、文本批评与创作梳理的同构 由“感性化”批评向“知识性”批评的转变

有关王安忆80年代小说的评论中以作家作品为论述对象的文章还是比较集中的,大多数以具体的作品分析为主,夹杂着对作家创作的一些评论,这也是今天普遍存在的一种批评模式。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80年代早期的文学评论中出现了一批比较典型的只谈论作家不涉及文本分析的文章,主要包括陈映真的《想起王安忆》,茹志娟的《也谈王安忆》,袁敏的《她像山溪一样清澈透明——王安忆印象说》,等等。它们的共同特点在于:把作家本人当作一个人物个体来写,带有散文或者说是记叙文的风格,文中也会涉及对作品的谈论,但都是浅尝辄止,甚至是读后感式的评论。比如,陈映真的《想起王安忆》中就这样写道:“这里刊出的《本次列车终站》就是其中给予我极为深刻印象的她的作品之一”,“她在作品中所透露的批判,虽然没有大陆年轻一代哲学家的深刻,但她所提起的质疑,却有王安忆独有的认真和诚实,感人至深。”^[3]

不能说这种散文式的批评没有研究的价值,也许在今天看来这些文章都不能算是严格意义

上的文学评论。但在文学批评渗透着“舆论化”情绪的80年代,在“主体论”和“启蒙论”的思潮影响之下,“以作家为中心”的“社会化批评”还是能站住脚跟的。因为在较长的一个时间内,“公共空间”过度地挤压了“个人空间”,特别是五十年代中后期到文化大革命,“个人意识”几乎被推到了一个绝境,“以至‘四人帮’倒台之后,‘人的发现’‘人的觉醒’‘人的哲学’的呐喊又声震一时。”^[4]在80年代初期,“个人建设”几乎成了知识分子关心的头等大事,他们通过不同的文学形式去修复和创建“个人的精神世界”,同时通过“个人”的声音表达对社会或褒或贬的看法,变相地传递了个体参与“社会建设”的热情。于是,我们看到在这些文学批评中,大量拥挤着“我”和“她”这样的形式主语,同时也充斥了“社会”这个形式宾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感觉到这些文学批评似乎并不那么“纯粹”,它们着重在表达个人的主观感受,与我们今天看到的以理性与客观为标准,讲求逻辑推理与理论依据的文学批评有很大不同。

但这种“感悟性”批评的文章在对王安忆80年代中后期创作的评论中比例越来越小,与此同时,“知识性”批评的文章却越来越多涌现出来。正如程光炜在他的《80年代文学批评的“分层化”问题》中谈到的:“1984、1985年后,由于以索绪尔的《语言学教程》、弗洛伊德的《精神理论分析引论》、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文心心理研究等涌现国内,‘知识化’的批评开始代替‘感性化’的批评并在新潮批评家那里流行”^[2]。这其中有这样两篇文章值得我们注意:周介人的《难题的探讨——给王安忆同志的信》和蒋原伦的《失落了优美之后——谈王安忆创作中的直观把握》。

之所以把这两篇关于作家创作的批评文章提出来,是想说明一个现象:尽管周介人发表于1983年的《难题的探讨》,还处在一个“历史美学”的批评范畴下,也就是说,如果“80年代中期前的文学批评,可以称之为‘历史美学’的批评。在批评活动中,批评家都是根据自己的历史经验和美学眼光介入作品文本,这种批评最突出的特色之一就是批评家依据‘感性’来看待作家作品”^[2],那么,它也明显与之前的纯粹“个人感悟”式批评不同,周介人的历史经验和美学眼光明显受到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并开始运用西方的文艺理论思想进行小说批评。而发表于1986年的《失落了优美之后》

则更像是一篇“文艺理论”的文章,其间充斥着大量的“知识性术语”,哲学、美学、心理学分析掺杂其中,作者似乎迫不及待地要把西方的文艺理论知识全盘托出。从这两篇文章,我们能清晰感受到“感性化”批评向“知识化”批评过渡的过程。这个变化过程的促成表面上是因为大量的西方文艺理论知识被翻译和引进,更深层的原因则是“80年代的中国,自始至终贯穿着用‘改革开放叙述’取代‘阶级斗争叙述’的社会导向”^[5],这种社会导向促使80年代的文学有强烈的“走向世界”的诉求,这样的现代性焦虑也促使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知识结构和语言系统的更新,由此,才能更好地融入世界文学体系之中。

二、批评姿态与文学经验潜隐方式:“社会舆论化”倾向下“文学本体论”的矛盾建构

程光炜在《当代文学在80年代的“转型”》中提到:“当代文学在80年代的转型,在1977—1984年间的表现是,在‘十七年’中寻找资源,很多提法主张,如‘回到五四’、‘新启蒙’等等都是强化放大‘十七年的存在’。1985年前后,当代文学的‘转型’在走过‘回收’阶段之后,日益主动地表现出与‘十七年’的历史相剥离的倾向。先后出现的诸多‘文化事件’,如‘文化热’、‘方法热’、‘寻根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等,不约而同地以‘遗忘十七年’的方式展开了它对所谓‘真正’的当代文学的‘共同想象’。”^[6]实际上“十七年”作为一种历史经验和文学记忆参与了整个80年代文学的想象与建构,在这个想象与建构的过程中,批评家不断对这种经验和记忆进行着重返、拒绝、清理、挑选甚至遗忘,从依赖到回避、从批评主体的激进化遗忘姿态到先前文学经验的潜隐难消,这些都表明了十七年文学批评所留下的隐秘痕迹。也就是说,尽管80年代是一个文学辉煌的时期,但这种辉煌始终无法回避它与十七年时期文学历史的关联,或者说那个被作家和批评家、研究者有意绕开的十七年时期的文学遗产始终不曾与80年代文学彻底分离。

80年代的新潮批评家们许多都是77、78届大学生,他们的知识结构、批评观念、语言体系都是在十七年“阶级斗争”的叙述中形成的,与社会的强大联系使他们在参与80年代文学批评的建构时,某种倾向于社会舆论化的批评姿态会无意

识地渗透在其文学评论中,并“泛化为将作品的‘社会影响大小’视作文学批评的评价尺度”。^[2]比如1980年曾镇南的《秀处于林——谈王安忆的短篇小说》中就这样评论道:“不过,虽然作者做了这些努力,我还是感到她对社会现象的观察太直线化了”,“有的读者可能会觉得,这样的主题,在思想解放运动已有相当发展的现在,算不上特别新颖了”。^[7]像这样“社会舆论化”姿态十足的文章在1985年之前的对王安忆小说的评论中大量存在,这些批评实践的特点在于:它关注重大的社会问题和现象,重视小说“聚焦社会问题的功能和提示大问题的能力”,“仍然把文学主题、题材视为文学的根本价值与构成因素”。^[2]这样的批评姿态与批评取舍标准当然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如此大力提倡社会影响与舆论表征的批评姿态与话语取向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削弱了作家的艺术创新性,另一方面也容易让读者在解读作品和阅读评论文章时感到枯燥、单一、乏味,而这些缺陷也为后来文学批评的转型提供了可能。

随着“回到文学自身”“关注文学本体”观念的相继提出,1985年之后的文学在逐渐远离“舆论化”的同时也开始慢慢向“纯文学”靠近,在此背景下“文学本体论”的思想才被重新建构起来。而“文学本体论”最重要也影响最大的两个观点则是“人本主义文学本体论”与“形式主义本体论”。8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态势中有一种“充满了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的历史情绪在抬头,许多文学讨论问题都聚焦在“人生意义”这一层面上。因而“人本主义文学本体论”主要也是围绕着“存在论”与“生命论”展开,这也更多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如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对人的存在问题的思考、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中关于无意识、性意识的说法及人格结构剖析等观念,它们都为新时期文学批评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于是,1986年王安忆在创作了“三恋”系列之后,当时几乎所有的评论都是从“生命意识”与“性意识”的角度进行阐释和批评的,比如杨斌华《生命的苦闷与饥渴——读王安忆的中篇〈小城之恋〉》、寄南《不要用“性”将人肢解成碎片——“三恋”的断想》、陈默、朱霞《爱的悲剧与人的命运》、嵇山《性:一个令人困惑的文学领域——关于“三恋”的思考》、段崇轩《生命的河流——对王安忆“三恋”的一种理解》等。此外,关于“形式主义本体论”,它的思想资源主要来源于形式主义文论、结构主义诗学、索绪尔的语言

言学、卡西尔的文化符号学等。在 80 年代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之下,各种西方知识系统被大量引入,西学东渐成为当时文学批评的潮流,文学研究从“人本”转向“文本”,由关注“内容”转为重视“形式”。由此,再来看 80 年代王安忆小说评论的总体趋向则会发现对“文本”的批评基本都集中在 80 年代中后期,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1984 年南帆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上的《王安忆小说的观察点——一个人物,一种冲突》,该文主要从小说的叙述视点谈起;1985 年程德培发表的《一种共时态的叙述——从〈小鲍庄〉看王安忆创作主体上的转变》与《结构:作为一种现实的态度——评王安忆小说近作的结构艺术》,这两篇批评文章分别是就叙述时态与结构方式两个角度进行王安忆小说的阐述;1986 年陈思和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发表的《双重叠影·深层象征——谈〈小鲍庄〉里的神话模式》则采用叙事学原理,侧重于探讨小说中的叙事技巧,包括隐性结构、象征手法等;常美发表在淮阴师专学报上的《江淮方言与王安忆小说的艺术韵味》则纯粹从语言学角度分析王安忆小说特色。由此可见,80 年代中后期的文学批评已经形成了借用西方文艺理论的多样化观点进行带有极强“知识化”姿态的解读,几乎都是对针对文本进行的“知识性”的批评,这反映了当时批评家已经开始关注文本的语言、结构、意象、叙述等层面。而当今的文学批评也大体沿用了这一模式,所不同的是当下的文学批评则在批评的理论化方面更加自觉,但同时也多少失却了 80 年代中后期文学批评中的丰沛元气以及应有的深厚历史感。

但以上所论并不意味着当代文学在 1985 年前后走过了“回收”阶段之后,开始把眼光从“社会”转向了“文学本体”时就可以完全规避它的前史,因为,建立起新的文学批评模式无论如何都充满着与先前文学批评经验的纠缠与混杂,最明显的表现则是“社会舆论化”的批评仍然潜伏在“文学本体论”批评的建构当中,其影响是挥之不去的。这就出现了“社会舆论化”倾向下“文学本体论”的矛盾建构症候,而这样的批评姿态实际上也说明 80 年代文学批评观念的不自明性,在 80 年代中后期的王安忆小说批评中就能看到自相矛盾也充满内在悖论式的小说文本阐释与评价。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是陈思和 1987 年发表在《当代文坛》上的《根在哪里?根在自身——读王安忆新作〈小城之恋〉》,这篇文章非常生动地反映出

了 80 年代文学批评从“舆论化”向“文学本体论”转化过程中的犹疑,即:“有人会说,这部小说虽然写了性,却没有揭示出性背后的社会意义,没有写到社会对性本能的压迫。”“可是,这种痛苦的挣扎,不正是反映了主人公们心灵深处的一种恐惧,一种束压,一种犯罪感么?社会背景被虚化掉了,却转化为心理上的文化沉淀,通过无意识尖锐地表现出来。”^[8]在文中,论者不止一次地以辩论式的语态对强大的“社会舆论”进行着激烈的交锋,这说明在相对保守的 80 年代,这种新颖的“性意识”观念解读还并不能完全替代“舆论化”的解读,“舆论化批评”还是在某种程度上隐性式地制约着整个 80 年代的文学批评,正如程光炜所说:“在文学的转型时期,公共舆论这只‘看不见的手’却是一个远比文学本身作用更大的推手。”^[2]

三、批评话语如何有效进入文学成规 80 年代王安忆小说评价中的理论盲点

今天的“文学史”通常把王安忆的作品定位在“女性文学”的篇目里来谈,但是,这一范畴的划定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广泛兴起之后,当我们把视角拉回到 80 年代的时候会发现,王安忆在创作的初期,她本人对自己的创作方向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位,而当时的评论界也同样没能对她在女性文学意义上的层面给予有效命名,当然在后起的文学批评界对王安忆小说创作进行所谓的女性主义或女性文学的系统阐述时,作家王安忆却一直对此不予认同,于是,批评的滞后与作家对某种文学潮流标签的抵抗也提出了一个如下问题,那就是:文学批评话语如何有效进入文学史的叙述成规中。事实上,80 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还处于萌芽阶段:“主要是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批评文学史和文学研究对女性形象的误解及其透露出的男性趣味,而真正用性别视角研究作品,或者用女性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创作现象的还很少。”^[9]因此,在梳理对 80 年代王安忆小说进行关注与批评的文章时,会发现从女性主义角度对其小说进行批评的文章相较于对作家作品本身的批评仍是非常少的,而且这种女性主义的分析依旧小心翼翼躲藏在“社会学”批评的大旗之下。

在所能收集的文献中,从女性主义角度进行王安忆八十年小说分析和论述的文章只有五篇,

其中有两篇评论值得注意。一篇来自于王绯 1988 年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上的《女人在神秘巨大的性爱力面前——王安忆“三恋”的女性分析》，论者把焦点对准了“性爱”这个敏感的区域，用女性分析的阅读方法阐释王安忆的“三恋”。她认为在“女性感觉里，‘三恋’的炼狱并不单纯以伦理的仲裁为归结”，而是要“揭示出性爱在人类经验里所具有的神秘深度，赋予作品性爱力之于女界人生的认识价值”^[10]并分析了“三恋”中女性人物的心理，对其进行了社会学的解读。这篇评论的意义在于它虽然还是从“社会学”的这种主流与权威话语角度切入，但是已经开始从男性文化视域转向了女性文化视域，由此分析作家和作品中女性人物的女性意识及这种女性意识背后的社会学价值。

除此之外，更加值得重视的是刘敏 1989 年发表在《文学自由谈》上的《天使与妖女：生命的束缚与反叛——对王安忆小说的女权主义批评》。在 80 年代女性主义批评还处于萌芽阶段的时候，就敢如此自信地在标题中醒目地亮出自己批评观点的文章这并非哗众取宠。论者在该篇评论中就王安忆小说展开了三个方向的批评：第一，是从写作立场的角度来看，探究王安忆的女性立场，包括她女性立场的生成、演变及其在小说中的表现。第二，是从写作方式的角度谈论小说的女性叙述视角以及讲述方式。第三，是从写作的社会背景角度进行解读，认为“尽管妇女写作努力想达到男性文化的成就，但她们的潜意识里无形中已经接受了这种男子对女人的偏见”^[11]。从这三个视角我们可以看到，批评家仍然是把王安忆的女性写作放在主流或者说是权威话语的参照系中，在这样的规约之下去探讨女性写作的创作环境与女性的生存环境，但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篇评论不仅运用了女性的视角研究作品，还运用了女性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包括女性叙事视角、女性主义写作立场等等，可以说这篇小说评论对 90 年代女性主义批评大潮的出现起到了示范作用。

如果说在文学批评家的敏锐感觉中对王安忆 80 年代小说创作的女性主义内涵进行挖掘还只是显现了批评主体所应有的文学阅读敏感性与整体文学批评环境间的抵牾，那么在论述 80 年代文学思潮时“寻根文学”是怎么也无法绕过的一个带有强大批评印记的文学史命名。尽管在“重写文学史”的再解读热潮下对“寻根文学”价值判断出现了不少争议，但放置于今天“重返 80 年代”的思想

史背景中来看，那么“寻根文学”是必须要翻检的命题。王安忆之所以能和“寻根文学”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在她创作的转型期写出了一部探寻中国传统“仁义精神”的《小鲍庄》，而她所有的创作中能“和‘寻根文学’获取连缀关系的也仅仅只是这一部小说”。因此，在 80 年代的对王安忆小说的批评实践中能高屋建瓴地提取出《小鲍庄》的“寻根意义”的篇目可谓少之又少。其中最直接地把“寻根文学”与《小鲍庄》挂名起来的评论则是来自台湾的学者陈信元先生的一本著作《从台湾看大陆文学》，其中有一篇文章即是《性爱与寻根——小论王安忆作品》。该文并没有对王安忆的小说作品进行深入探讨，只是做了一个简要的梳理式与介绍式的评论，甚至采用了最原始的从生平事迹谈起的批评方式。但是，这篇在今天看似平常无奇的评论文章却因年代、地域、历史、文化、政治等因素的介入而对我们今天重新以王安忆小说为出发点来对 80 年代的小说批评进行再评价时产生了深刻的研究启示与反思价值。陈信元先生从 80 年代初就开始收集整理大陆文学资料，对 80 年代的文学状况有比较清晰的认识。这本专著《从台湾看大陆文学》出版于 1989 年，书中对大陆 80 年代文学概况作了一番梳理，其观点基本与文学史所确立的文学成规不谋而合。比如关于王安忆的这篇中篇《小鲍庄》，陈信元先生就做了总结性的论说：“《小鲍庄》可列为广义上的《文学寻根》作品。”“这部作品反映了大陆新一代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探寻”。^[12]而像这样总结性的判断在 80 年代大陆文学批评界对王安忆《小鲍庄》的评论中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当然，也有一些评论文章会提到这部作品的“文化意义”，但也没有明确提出这部作品与“寻根文学”的关系，比如 1986 年陈思和发表在《文学自由谈》上的《对古老民族的严肃思考——谈〈小鲍庄〉》。甚至还有的评论文章无法确定它是否属于“寻根文学”，如楚民的《幽婉的情感美——王安忆小说的特色》就这样说道：“近年来，我国的文学创作中有一股‘文学寻根’的热，引人注目，我不确定，《小鲍庄》是否属于这股潮流的产物。”^[13]这一现象不得不引发思考。

80 年代末期其实也还是处在一个文艺争鸣和观点交锋频繁而活跃的时期，对大部分作家作品的批评和阐释仍处在一个历史性的生成过程中，而当时的大陆文学研究界面临这样的批评热潮很难迅速在文学史成规中给予活跃在 80 年代

文坛的作家及其作品一个相对明确的定位。那么,陈信元作为一位台湾的大陆当代文学研究学者,何以在1989年就早已预言了这些作家在当代的历史地位?这里有很多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一方面,相较于台湾学者的恳切判定,大陆文学评论家对本土文学作家作品的评判明显暴露出了80年

代文学批评意识的单一和窄化。另一方面,这样的尴尬也凸显了文学批评话语与文学史叙述成规之间所存在的相互漠视,当代文学批评在文学批评话语的边界设定上似乎始终无法超越文学史研究者所给定的阐释构架和解读范式。

参考文献:

- [1]程光炜.“当代文学”的理解:基于80年代文学研究[J].艺术评论,2011(9).
- [2]程光炜.80年代文学的“分层化”问题[J].文艺争鸣,2010(5).
- [3]陈映真.想起王安忆[J].台港文学选刊,1985(2).
- [4]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J].走向未来,1986(1).
- [5]程光炜.“批评”与“作家作品”的差异性——谈80年代文学批评与作家作品没有认识到的复杂关系[J].文艺争鸣,2010(9).
- [6]程光炜.当代文学在80年代的“转型”[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 [7]曾镇南.秀处于林——谈王安忆的短篇小说[J].读书,1981(4).
- [8]陈思和.根在哪里——根在自身——读王安忆新作《小城之恋》[J].当代文坛报,1987(2).
- [9]魏天真,魏天无.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本土化历程及其问题[J].外国文学研究,2011(3).
- [10]王绯.女人在神秘巨大的性爱力面前——王安忆“三恋”的女性分析[J].当代作家评论,1988(3).
- [11]刘敏.天使与妖女:生命的束缚与反叛——对王安忆小说的女权主义批评[J].文学自由谈,1989(4).
- [12]陈信元.从台湾看大陆当代文学[M].台北:业强出版社,1989:131-135.
- [13]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丛刊4[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150-164.

[责任编辑:廖传江]

(上接第8页)

人执行,人为主动,法为被动。法用得好的可以帮助人治理国家,用得不好会起相反作用,人不能视法为万能。苏洵对人与法的认识,应该说是符合辩证法的。

四

从表面上看,苏洵《上皇帝书》只是在议论朝政得失的基础上提出改革弊政的建议,但仔细读

来,却可以窥见到苏洵的政治修养、国家观念、道德水准、人民情结、辩证思想、进取意识等精神层面上的诸多积极因素。这些积极因素,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延续、发展的长河中冶炼出来的精神结晶,是炎黄子孙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古代文人刻苦修身养性所追求的高尚操守。苏洵身上的这些高尚操守,也非常值得今人学习、借鉴。

注释:

- ①劝,勉励,引申为鼓舞。
- ②作,通诅,诅咒,此处引申为去除。
- ③给,口齿伶俐。不给,连话都不会说了。
- ④县令,指非由京朝官出任的县长官。
- ⑤赞拜,臣子朝拜帝王时,赞礼的人在一旁唱礼。
- ⑥两制,指中书舍人与翰林学士。
- ⑦两府,指中书省和枢密院。
- ⑧释褐,脱去布衣。
- ⑨专对,随机行事,独立应对。捷给,言辞敏捷,善于应对。
- ⑩郊祀,在郊外祭祀天地。
- ⑪嘉谟,美善的谋略。
- ⑫目前还未发现明确记载苏洵十八岁进京应试的直接史料,但据一些文字推断,他曾在十八岁时进京应试。
- ⑬汉文帝诏书中语。匡,纠正。不逮,不周到之处。
- ⑭有治人,无治法:只有把国家治理好的人,没有不管在什么条件下都能把国家治理好的法制。
- ⑮羿之法……不世王:后羿射箭的方法尚未失传,但他并不能使世世代代的人都能百发百中。夏禹推行的法制仍然存在,但他的后代并未因之称王至今。
- ⑯类,法的同义词。
- ⑰斯,则,乃。

[责任编辑:方忠]